

#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刘 鹤 易 纲 宋国青 郑京平 樊 纲  
严瑞珍 王小鲁 贺力平 张 平

中国经济已经持续20年高速增长,未来中国经济能否继续高速增长?1996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风波之后,国际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将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方面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为了深入探讨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问题,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与管理世界杂志社于1998年12月在京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就中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方向与调整力度,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深化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等若干问题,各抒己见,以期为实现我国经济跨世纪的稳定增长做些有益的探讨。

国家信息中心主任 刘 鹤

## 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两个观念的澄清

1998年以来,随着中国通货紧缩现象的出现,不少学者提出了较为悲观的看法,认为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完结,中国将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结构调整期,而不太可能“突破20年高速增长的物理极限”。

在现代增长理论中,有新古典派和结构主义之分,新古典派认为,增长取决于储蓄率,资本产出系数和劳动力增长;结构主义则认为,增长取决于结构转换过程的推进——增长是非均衡的,它从某一瓶颈突破,引起需求结构、生产和贸易结构及城乡结构的变化,当非均衡状态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增长将持续下去。无论用新古典派的标准还是用结构主义的标准衡量,中国经济都具备了长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力和大部分条件,这至少包括以下几点:(1)极高的国内边际储蓄倾向和总储蓄率;(2)资本系数(技术条件)的不断变革;(3)充裕且素质不断提高的劳动力供给;(4)

巨大的国内市场;(5)以城市化水平为标志的城乡结构非均衡;(6)非国有经济发展不到位体现的体制非均衡;(7)地区收入差异体现的地区结构非均衡;(8)国际化水平低体现的贸易结构非均衡。在这些条件下,在未来10年,中国的三个基本趋势:城市化(城乡结构的大调整)、市场化(所有制结构的大调整)、国际化(国际分工按比较优势原则的大调整)将为高速增长创造物理空间、动力机制和运作惯例。

当然,任何大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转轨经济大国的经济增长,都意味着复杂的制度变革过程,它从来不可能自动持续下去,而需要创造一系列条件,由于篇幅有限,恕不在此展开增长条件的讨论(如果读者有兴趣,可参考《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条件》一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如果中国经济不抓住增长的好机会,在人口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尽可能快地解决结构性改革的历史任务,就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了。有人认为,增长不重要,而效益和质量才重要,这种说法实际在犯逻辑错误:在一个买方市场已经出现的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以质量和效益为前提,对此,这里不再做具体解释。

怀疑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同仁在两个问题上动摇(恕我直言)。

第一,把短期的周期现象与长期的结构现象相混淆。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起,经历了又一个经济周期,具体时间始于1989年或1990年,终止于1998年或1999年。解释周期现象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从太阳黑子到技术创新,从投资信贷扩张及收缩到实物资本的物理磨损极限,的确众说不一。但周期存在的事实不容置疑。中国这次周期,先于世界经济周期一年,也极可能比世界经济周期早结束一年。(现在,人们较多地讨论亚洲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但从周期的角度进行分析,中国的经济涨落似乎更具有主动性。)在周期向下运动的阶段,人们的预期往往是悲观的,这一点可以理解,但这时的判断并不可靠。我还想借此机

会,重复大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一个著名观点,在周期上升阶段,信用扩张和自发投资扩张具有意义,而在下移阶段,利率政策似乎失去功效。因为人们的预期不乐观。想强调的是,这种现象与新古典派讲的流动性陷阱毫无关系,而与周期因素关系密切。因此,在不同的周期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交换使用可能是有意义的。

第二,把结构性选择的误区与结构调整的空间相混淆。

最近,人们常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投资机会在哪儿?哪儿是结构性的经济增长点?制造业全面过剩,基础产业似乎消除了瓶颈,服务业缺乏增长动力,大国的市场机会似乎转瞬即逝。真的没有增长点了吗?“六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明显的增长点是农业和轻工业;“七五”计划期间,国内轻型产业制造能力的扩张和对新技术的需要,引起了沿海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推出;“八五”计划期间,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拉动了大国经济的增长;事实上,“九五”计划期的重要增长领域不在于汽车和其他支柱产业,把高新技术产业视为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点也似乎勉强。真正的增长点应是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使29%的城市化率追赶上50%之高的工业化率,同时把产业政策的重点转向中小企业。遗憾的是,这个命题在1998年水灾之后才获得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城市化是拓展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真正物理平台,似乎过时和过剩的“重复生产能力”可以顺利地获得新生——从钢材、水泥、玻璃、电力到机电轻纺产品,从传统的服务到新型的国产ATM和程控机。

重要的问题是对增长的共识和对创造增长条件的共识。最近,大部分专家都对网络型微机失去了兴趣,虽然这种终端设备成本低,但它却把个人对计算机的兴趣抹杀了,把一切引人发明创造的条件交给了统一的外部网络——我们需要重视的恰是这个基本问题,使创造增长的人和阶层具有创新的兴奋和动力,为企业家和创新者提供条件,而不是把这些条件抛在一边,创新是高于一般经济道理的大道理,如果对此有怀疑,建议拜读《大国的兴衰》。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副秘书长 易纲

## 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强调质量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怎样强调质量也不过分。有人怀疑我们的经济增长数字有问题,但我们相信,我们目前得到的数字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最好数字。目前,我国的经济统计数字总体而言有效,7%~8%的增长确实存在,也确实是高的。但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增长的质量。中国的增长质量总的来说很低,其中包含了太多无用功。举一个增长速度做的是无用功的典型例子:房屋装修在我国是一个规模不小的行业,开发商在居民住宅楼交付使用之前一般要做一下粗装修,门窗、橱柜、厕所用具都安装齐备,但单位买来房子交给个人后,入住者会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拆掉,把墙刮掉重新装修,为什么建设部不能交毛坯房呢?回答是国家管理部门对安全、质量都有规定,不按规定完成,不能交付使用。因此,建房的时候是道GDP,铲掉后又是一道GDP,重新装修还要算一道GDP,这样一来GDP是增加了,资源也浪费了,试问这样的GDP是否有意义?我也不同意有人做的就业与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分析,未免太简单太机械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增长速度和就业的增长的关系相当复杂,要做具体分析。

有些人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应该追求速度,不必追求质量和效率,并且认为经济发展必须要维持高速度,这种看法站不住脚。不妨举出一个反面例子,法国巴黎最好的房子有许多是拿破仑时期建的,距今200多年。为什么200年前的法国能注重质量,而我们到现在还不能谈质量和效率呢?1991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八五”计划和10年规划规定,我国经济增长率应为平均6%,细细想来,当年的规划是有道理的。

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如果所做的只是为了增长,就需要对增长作一个彻底的讨论,就需要对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有一个低效的高速度之类的观点进行严格的检验。财政政策能创造就业

机会吗?能,但恐怕很有限,我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关键是城市就业的问题,有没有人算过铺路、修桥用的农民工究竟有多少?还要问的问题是,就算扩张政策能够解决目前的就业问题,但一旦不能持续,过两年衰落下来怎么办?

用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要在讲究效率、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现在银行的不良资产有相当部分是1992~1993年经济过热时形成的,我们的M<sub>2</sub>对GDP的比例已达到130%,美国的M<sub>2</sub>与GDP的比率只有0.68,韩国为0.7,印度是0.47,都比中国低得多。日本大约为1.64,日本金融资产高的负面影响现在人们已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储蓄都在银行,银行的效益不好,还要往外撒票子,情况会很危险,因此,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支撑经济增长,又防范金融风险,这样才能实现长远的可持续性的增长。

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供给增长就等于经济增长,从相当意义上说政府要增长多少就能增长多少。因此,只需打开货币的闸门,经济就能增长,生产就能上去,因为没有卖不出的东西,但是即使这样,经济增长也一样不能持续。1958年增长了,1959年就下来了,1960、1961年出现了灾难。我国现在已处于受需求约束的市场经济中,在买方市场下,只有在市场上实现的供给才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第一重要。政府刺激生产,国企受益较多,供给会增长,但很多是未实现的供给。因此,依靠刺激,靠政府拉动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基于这种判断,我们应持有较保守的、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银行资产质量的倾向。

有人批评银行惜贷,支持经济增长不够,但如果银行敞开口子贷,根本不管能否收回,那样好吗?银行惜贷的意思是银行开始“珍惜贷款”了,这在以前是大家所希望的局面,如果在计划经济下,银行就珍惜贷款,就不会有众多重复建设的项目上马,也就不会有太多无效、低质的经济增长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银行惜贷是一种好现象,表明中国的银行开始向国际标准的商业银行转变。银行现在搞出一套制度来,审贷分离、审贷评审委员会、第一责任人、第二责任人、第三责任人,每个环节都有一整套程

序, 来之不易, 是多年来金融改革的进步。

由于近几年 GDP 的下滑态势超出人们预料, 人们开始对中国中长期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示悲观, 尤其是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 更使人不仅从数字上而且从感觉上不太相信中国还能再度出现以往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中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一直放在需求管理上, 增长的基本格局不变, 那么以上的担忧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 如果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转向推动结构转换、消除供给约束的供给政策, 仍能保持中长期高速增长。从目前的情况, 我们分析中国存在可持续性高速增长的五大空间, 这五大空间应该是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方向。

1. 城乡结构转换空间。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产生一个严重的结构畸形问题是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城镇化进展缓慢, 城乡分割严重, 城乡差距从一度缩小再次扩大为超过改革开放以前的程度(约 2.4 : 1)。城镇化进程缓慢的一个后果是农村居民收入低, 消费需求较低。中国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极大, 但我国目前的重化工业增长势头, 只是由城镇居民消费升级所引发的, 占全体人口 70% 的农村居民, 消费结构远未达到足以引起工业增长向重化工业方式转换的时期。目前, 中国的消费市场表现出需求不足, 产能过剩。据估计, 中国目前产能过剩最严重的家用机电产品中, 只有自行车和电风扇基本饱和, 彩电、冰箱、洗衣机等 11 种产品的全国平均普及率仅在 25% 左右, 如果中国农村城市化步伐能达到国际平均水平, 中国市场需求就会呈现比较好的梯度, 仅家电产业至少还可以高速增长 20 年, 耐用消费品对中国的带动至少还有 10 余年。因此, 现阶段投资的方向之一应向城市化发展方面倾斜, 以加速城市化进程为中心来调整投资方向。适当加大居民住宅投资与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的比重, 通过促进城市化, 实现大规模过剩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扩展就业的空间和层次, 实现收入支出结构和总水平的调整和升级, 带动产业关系的转变和重组, 从而形成新的宏观供求格局。

2.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空间。所有制结构的变

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演进的最为根本的制度原因。我们发现, 国有经济的投资比例持续下降, 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比例持续上升, 伴随着这一变化, 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的更大的变化。从下表可以看出, 1986 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大致相当(固定资产投资: 国有经济 66.6%, 非国有经济 33.4%; 工业总产值: 国有经济 62.3%, 非国有经济 37.7%)。但到 1997 年, 两种经济体占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 国有经济仍然是主体, 比重为 52.5%, 非国有经济为 47.5%; 但在工业总产值中, 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到 25.5% 而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上升到 74.5% (这里有统计口径的变化, 如果将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成份算到国有经济中, 大约是国有 1/3, 非国有 2/3)。这一点可以由这两种经济体的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更明显地观察到, 除个别年份外, 非国有经济的产值增长速度远高于国有经济。从 1986 至 1997 年, 非国有经济占投资的比重平均上升 1 个百分点, 其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就上升 2.61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尽管投资主体一直是国有经济投资, 但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效益远高于国有经济。因此, 非国有经济的成长, 将换来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

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和产值比较 (%)

	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工业产值增长(现价)		
	国有	非国有	国有	非国有	总计	国有	非国有
1986	66.6	33.4	62.3	37.7	15.2	10.6	23.7
1987	64.6	35.4	59.7	40.3	23.4	18.3	31.7
1988	63.5	36.5	56.8	43.2	31.9	25.5	41.5
1989	63.7	36.3	56.1	43.9	20.8	19.2	22.9
1990	66.1	33.9	54.6	45.4	8.7	5.8	12.3
1991	66.4	33.6	56.2	43.8	11.3	14.5	7.5
1992	68.1	31.9	51.5	48.5	29.9	19.2	43.7
1993	60.6	39.4	46.0	54.0	42.8	27.5	59.0
1994	56.4	43.6	37.3	62.7	42.1	15.3	64.8
1995	54.4	45.6	34.0	66.0	30.9	19.2	38.0
1996	52.4	47.6	28.5	71.5	8.4	9.2	17.5
1997	52.5	47.5	25.5	74.5	14.2	2.3	18.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3. 产业结构调整空间。对产业政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研究表明, 产业政策正确与否对经济增长关系重大, 尤其是连续正确的产业政策能够产生的并不是简单的叠加的增长效应, 而是累积的效应。

伴随买方市场的出现, 中国工业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 调整任务日益紧迫。1998年上半年工业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工业增加值与去年同期相比仅增长7.8%, 增幅回落3.7个百分点, 不仅表明工业增速放慢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 还说明整个工业尚未走出调整期。但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平均增速较低, 居然还有像电子通信这样增长速度近30%的绝对高速成长的产业。

80年代被认为是我国经济由消费需求所主导的轻型产业主导增长时期,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由于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 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进入到由储蓄和投资需求所主导的重化工工业阶段。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 在进入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后, 经济增长有可能维持20年左右高达两位数的增长。当前的问题在于, 虽然重化工业中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原料已发展到近乎“相对过剩”的地步, 但重加工业却并未得到相应的发展, 其中的关键则在于投资比例太低。因此, 虽然存在对重加工产品的最终需求, 却难以拉动与其相关的中间产业的发展, 也就不能吸纳90年代以来新形成的基础产业(能源、电力、钢材、水泥、玻璃)巨大生产能力。为此, 有必要重新思考产业政策取向, 对需要振兴的支柱产业进行倾斜, 特别是有效增大投资力度, 并对最终需求予以引导。

4. 区域结构转换空间。中国由于地域广大, 并存在三个明显的经济发展分级地带, 即呈现出产业结构明显差异的东、中、西部地区三个不同地带, 因此, 可以充分利用区域差异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从理论上说, 中国这样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 劳动力投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可因为区域差异的存在而长久保持, 支撑起中国30年的高速增长。

近几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已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特别是从1994年起, 我国中、西部一些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以至于1996年第一次出

现了中部地区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1个百分点的情况, 并体现出80年代沿海地区的增长特征, 即先是农业增长高峰, 然后是农村工业化高潮, 并导致港台地区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 向中、西部地区移动的趋势。1997年西部地区投资大幅增长, 达20.95%, 增长速度居全国之首; 中部地区投资增长9.7%, 增幅超过东部1.6个百分点, 反映国家布局在中西部地区的重点建设如南昆铁路、西南地区出海大通道等进展顺利。

国家应充分利用区域经济结构的大转换来拓展高速增长的空间。一是可以通过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 改善其投资环境, 吸引更多的投资, 借助于中、西部地区基础的发展, 使我国经济增长源源不断地获得廉价劳动力, 从而抵消他国货币贬值的压力, 长久地赢得国际市场。二是在东部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向更高的技术性产业发展时, 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以继续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5. 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中小企业的发展将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有活力的一部分。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个数占全国企业的99%, 雇用了75%的城镇劳动力, 新增就业机会中80%来自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大约占GDP的60%, 提供的利税占40%左右。

中小企业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中小企业的产权较明晰, 激励制度强, 因此效率高, 这已为各国的实践所证明。在美国的研发费用中, 大企业占90%, 中小企业占10%, 但是在1975~1995这20年间, 美国在市场上成功的科研成果按价值量计算, 中小企业却占了一半以上。第二, 中小企业每单位投资吸收的劳动力多, 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第三, 中小企业高风险, 每年新生及死亡企业大多数是中小企业。

目前, 中国的融资体制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直接融资基本上不对中小企业开放, 中小企业贷款难。经验表明, 每一个高效、持续发展的经济都有活跃的中小企业, 都较好地解决了如何支持中小企业的问题。如美国、日本、意大利、台湾省等, 支持中小企业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建立

科技、培训、管理、金融服务、法律框架等一整套的服务体系。就金融而言,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的建立和运行,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手续繁杂、费用高的问题,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小企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中小企业的成功将意味着我国经济效率、活力、就业即可持续有了基本保障。

综上所述可知,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是在给定的体制和结构条件下进行政策调整,熨平经济波动,是经济生活中的“短期问题”。而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来解决中国的中长期发展问题,以保障中国经济高效可持续地增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宋国青

## 未来 10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20 年以前,一个中国农民(男性壮年劳动力)一年的全部工资性收入约合 1000 公斤粮食,按今天的价格折 1500 元。现在,一个仍然被称为农民但实际上在城市的工厂生产比如说皮鞋的中国壮年劳动力,一年大约可以挣得 10000 元。后者是前者的 6.7 倍。不过现在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壮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大约合 2500 多公斤粮食,只达到原来的 2.5 倍多一点。每个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不同(劳动的边际产品或者工资率与劳动生产率不同,但两者增长率相近),各部门平均大约增长到原来的 2.3 倍,其中农业部门增长的幅度显著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全社会总的劳动生产率约为 20 年前的 3.3 倍。这里 3.3 倍与 2.3 倍的差额来自资源配置的改善。

内部效率提高是由一般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高以及像包产到户等改革引起的。外部效率提高是资源配置改善的结果,这里可能伴随着超常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比如农民转移就带有这样的性质。按照中国今天的价格,一个专业农民大约

需要用 40 年的全部工资性收入才可以买到一辆中档的轿车。但是如果他在工厂生产那些被称为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品比如纺织品,这些产品再被出口而换取汽车,即使效率还是比较低,但可能 4 年不到的边际产品就可以换得一辆同样的汽车。或者,如果中国将投入汽车等工业的资源转移出一部分用于生产相对的优势产品,并出口这些产品换汽车,效率是可以显著提高的。有一个说法认为,贸易保护等歪曲资源配置的做法可以帮助“幼稚工业”快速成长,从而导致长远的效率提高。但是保护也可以产生类似于中国汽车工业这样的“老顽童了”。减缓以至取消这样的保护无疑能提高全社会的总生产效率。这是中国过去 20 年高速增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

按照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 1978~1989 年的 20 年里平均每年增长 9.7%;国民生产净值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9.1%。由于统计办法的一些问题,公布的数据可能使增长速度偏高一些。我想,扣减掉 1.5 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可能比较合适。这样实际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 8.2%。另外估计 1998 年的实际生产水平比潜在生产能力偏低 4 个百分点(估计长期增长的时候,一般用高峰比高峰或者低谷比低谷的方法以避免短期波动的影响)。加上这部分,潜在生产能力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4%(按统计报告数为 9.9%)。

过去 10 多年里,部分由于像亚洲奇迹这样的经济现象的刺激,增长经济学迅速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也有许多论文。我觉得这些文献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是高估了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的贡献。通常的估计是将资本的份额估计为 0.4。按此推算,当前中国的税后真实投资净报酬率平均超过 100%。这是很难思议的事情,因为过去 20 年的银行定期存款真实利率平均大约 1.0%。首先,对包括农民在内的众多小业主来说,平均的税后投资报酬率不可能比银行存款利率高出太多,因为这些小业主的大多数同时有定期银行存款。其次,对很多乡镇企业来说,进行一定的社会集资并不十分困难。至于大型企业,税后利润率不是偏高

而是偏低。最近几年公布了分省的 GDP 要素收入份额, 显然不支持资本份额高达 0.4 的估计。根据这些和其他情况, 我估计资本份额为 0.33, 这里还包括 0.7 的土地类资源的份额。

按照 0.26 的资本份额和 0.67 的劳动份额, 中国在过去 20 年里, 总投入资源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4.5%。其中社会劳动力平均增长 22%, 直接导致 1.5 个百分点的 GDP 增长; 资本存量年均增长 12.0%, 导致 3.0 个百分点的 GDP 增长。从 8.4% 的潜在 GDP 增长中扣减掉这些, 剩下的 3.7% 是效率提高的结果, 包括一般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高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等方面。参照中国的一些数据和国际经验, 也带有更大程度的主观性, 我倾向于将这 3.8 个百分点对半分为内部效率提高和外部效率提高的贡献。

这样的分解当然是为了对以后的预测。下面估计 1998 ~ 2008 年的情况。第一, 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增长率将由过去 20 年的 2.2% 下降到 1.4%。这是由过去的人口生育情况决定的, 已经给定了。第二, 效率提高的贡献由前 20 年的 3.7% 下降为 2.5%。一个原因是资源配置改善的基础是基期的配置歪曲。当这种歪曲得到一定改善时, 继续改善的余地就会变小。不过目前还有相当大的潜力, 比如说改进户籍制度, 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 进一步放开汇率, 等等。但是这里有相当大的政策弹性。第三是资本存量的增长。资本存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后的投资, 是内生的。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 效率的提高, 税收和其他, 都会影响到投资报酬率。所以这是一个均衡的结果。估计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从前 20 年的 12.0% 下降到 9.5%。这样合起来, 潜在 GDP 的年增长率可以达到 6.0%。由于作为基期的 1998 年的生产水平偏低潜在能力 4%, 实际实现值可以达到 6.4%。最后, 统计中的增长率偏高误差可能继续存在, 不过幅度可能会越来越小。加上 0.5 到 0.8 个百分点的话, 报告增长率达到 6.9% 到 7.2%。

中国经济投入产出年平均增长率估计和预测 (%)

	1978 ~ 1998 年实际和估计	1998 ~ 2008 年预测
总资源	4.5	3.4
其中: 社会劳动力	2.2	1.4
可再生资本存量	11.0	9.5
效率提高	3.7	2.5
内部效率	1.9	1.3
外部效率	1.8	1.2
潜在 GDP	8.4 (9.9)	6.0 (6.7)
实际 GDP	8.2 (9.7)	6.4 (7.1)
实际 NNP	7.9 (9.3)	6.1 (6.8)

注: 括号内的数据为报告数或预测报告数, 括号外的相应数据为调整数或者预测调整数。

由于劳动力资源增长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下  
降是逐渐完成的, 最近两年的潜在生产能力的增长率  
估计为 7.5 (不加水), 10 年以后会显著降低。不过在短  
期中, 经济波动的影响十分重要甚至起决定作用。

在上面的估计中, 已经考虑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金融体制和政策改变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过去 20 年的高增长中,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有资本的  
损失和对非国有投资的变相补贴, 后者的重要方式  
是赢了归投资者输了归银行的贷款。这种方式的效果  
和财政赤字一样, 可以在一定时期提高非银行企业  
的投资报酬率。如果这样的补贴逐渐减小, 会影响到  
投资的增长率。对中国来说, 国有银行的坏帐和财政  
赤字没有实质的区别。在日本那样的经济中, 银行存  
款最后还是由政府担保的, 银行坏帐也同样变成了财  
政赤字。这样的机制可以在一段时期起到推动经济增  
长的作用, 但是总有一天会达到无以为继的程度。现  
在不很清楚中国在什么时候会达到这样的程度, 但可  
以从日本的经验中得到一些启示。主要从广义货币与  
GDP 的比例来看, 中国现在的坏帐情况上大致相当  
于日本在 1975 年的水平, 尽管那时日本的人均 GDP  
按现在的美元币值算为 14000 美元。日本从 1975 年  
到 1990 年保持了 15 年的较高的增长速度, 然后才出  
现了明显的问题。中国坏帐的积累速度比日本更快,  
也许有 7 ~ 8 年时间就达到日本在 1990 年的水平  
了。不过毕竟还有一段时间。现在有了日本经验, 中国  
可能在未来注意控制坏帐。这会使短期的增长率再低  
一些而对长期增长有好处, 对今后 10 年的平均增长  
率可能不会有明显影响。

就长期增长来说,可以总结的东西太多了,这里只提一条。我觉得东南亚国家的经验教训应当成为人类的基本知识。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也有一些分歧不大的看法,首先一点是要实事求是。中国三年困难以后,从上到下都意识到了说假话的可怕后果,刘少奇说要立碑记住。东南亚国家的假帐也应当立碑。坏帐经济首先是假帐经济,而任何诺言都会讲出一些道理来,其中也许有看来冠冕堂皇的理由。最终看来,所有谎话都是没有道理的。尤其在各种资本市场上,真实信息是生命线。适当的政府监管是需要的,但是如果监管者不受监管的话,也许会出现越监管越坏的情况。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主任

郑京平

## 难度增加潜力仍大关键在政策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判断

国民经济研究所和管理世界杂志社主办的这次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亟需回答的问题:“中国经济经过 20 年的持续调整增长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一定时期(如 10~20 年)的高增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目前该问题在中国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而对该问题的回答又将直接引导着(或说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进而,引导或影响着今后 10~20 年中国经济的发展。

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相对比较集中,且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是:第一,中国经济增长在经历了 20 年的持续调整增长后,将进入调整期,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还是维持在 8%~9% 的高速度,而会降低到 4%~5%。第二,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 20 年的持续调整增长,但由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还在,今后 10~20 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如 8% 左右。我本人的回答接近于第二种观点,但多少附加了些条件:难度增加、潜力仍大、关键在政

策。即,今后 10~20 年中国经济增长可以继续保持高速度(8% 左右)。但难度与前 20 年相比增加了,最终能否将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关键在政策。下面我将对这一观点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为了回答“中国经济经过 20 年的持续调整增长后,是否能继续保持一定时期(如 10~20 年)的高增长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促使中国经济持续调整增长 20 年的主要因素。其次,分析一下这些因素是否还存在?发生和将要发生哪些变化?又有什么新的因素影响和将要影响中国经济的调整增长?最后,才能给出比较能说服人的答案。

### 一、促使中国经济持续调整 20 年的主要因素分析

回顾改革开放 20 年来中国经济持续调整增长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促使这一“奇迹”出现的因素,除了世界各国共有的一些因素外,主要有以下 5 个方面:

1. 体制改革因素。20 年前,以“一大二公”、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极大地挫伤了管理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极大地阻碍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出工不出力”、“混日子过”是对这一体制桎梏形象而深刻的描述。始于 1978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为了打破这一体制桎梏而开展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逐步取得成功,中国的生产力获得了又一次巨大的解放。被体制桎梏长期压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作为生产要素中居于首位的人的积极性一旦被调动起来,真可以说“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仅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例,全国普遍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总产量比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提高了 20% 左右。这可以说是促使中国经济持续调整增长 20 年的首要因素。

2. 对外开放因素。同样是始于 1978 年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缓解了中国这一发展中大国资金短缺、技术和管理落后的矛盾,并为中国利用国内市场之外的市场,即国家市场调节经济的发展节奏、调整国内需求的波动创造了条件。实行对外开放 20 年来,中国累计利用外资 3291 亿美元,相



当于累计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20%左右。随着大量外资的进入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科学管理经验被引进,与资金和被解放了的生产力相结合,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引导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1998 年进出口额将达到 3300 亿美元,比 20 年前扩大了 14 倍,1996 年以来,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正是出口的扩大保证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3. 低基数和短缺经济因素。所谓低基数因素是指,从统计学意义上说,当对比基数比较低时,只要稍微有些增长,其增长速度就会显得很高。如,以某人每天生产 1 个杯子为基数和以某人每天生产 4 个杯子为基数时,每增加生产 1 个杯子所显示的增长速度是大不相同的。对于前者而言,多生产 1 个杯子相当于产量增加了 1 倍,而对于后者来说,则只增加了 25%。而短缺经济因素是指,当经济处在短缺经济状态时,市场对企业的商品质量没有太多的要求,只要企业能生产出来,就不愁没有市场。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市场竞争不激烈。

4. 世界环境较好的因素。在过去的 20 年中,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外部环境是相当不错的。除了中越边境发生了一次局部冲突外,一直保持了和平的发展环境。而且,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平和发展一直是这个时期主旋律。这一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年均达到了 3.2%,世界贸易量的扩大也达到了年均 5.4% 的速度。相对稳定的世界环境、相对快速的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5. 高投入因素。过去的 20 年中,尽管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属于粗放型,经济的调整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靠高投入实现的。换句话说,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是以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为代价的。例如,人均耕地的占有量,已从 1978 年的 1.3 亩降低到目前的 1.1

亩。单位 GDP 的能耗是日本、美国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北京、上海、西安等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已排在世界大城市前列。广大农村由于对树林的乱砍滥伐、对矿产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已经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越来越快,灾害程度也越来越重。

二、今后 10~20 年,中国要继续保持经济调整增长,虽然难度增加,但潜力仍大

我们得出上述结论的主要依据是:首先,上述促使中国经济调整发展 20 年的主要因素,有些已经不存在,或不能再靠其发挥作用了;有的因素发挥作用的影响有所减弱。例如,在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环境保护呼声高涨的今天,对于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来说,靠高投入因素和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以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为代价来发展经济显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了。另外,低基数和短缺经济因素对中国来说都已经大大弱化了。经过 20 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总量按 1990 年不变价计算已经从 1978 年的 6550 亿元,提高到 1997 年的 38170 亿元。商品的供给也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进入了商品供给充裕,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时代。商品和服务商品的市场竞争已经相当激烈。经济体制改革虽尚未到位,仍有很多方面可以进行改革,但是,随着相对比较容易的改革的逐步推进,剩下的改革内容,大都属于难啃的骨头,改革的风险和难度较大。至于对外开放因素,虽然对资金注入和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的引进没有大的影响,但是,对外贸易的难度却在加大。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所引发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和世界贸易量扩大速度的减弱也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以上这些均说明,中国要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难度增加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过去 20 年间促使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中,有些因素减弱了,但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仍然是很大的。例如,体制改革因素,目前,我们的经济体制,距离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还相去甚远,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等均远未到位。其中,任何

一项改革的成功,都会给生产力带来巨大的解放,更不用说全面推进和完成这些改革对生产力产生的巨大作用。从需求角度看,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进入了商品供给充裕,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时代,但是,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还相当不平衡,生活水平还很低。吃穿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住与行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发达国家的人均居住面积为 30~40 平方米,而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还不足 10 平方米。净化和绿化环境、按照环境保护的基本条件去要求,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更多。改善生活的需求空间还相当广阔。绝不是像有一种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我国经济增长缺乏增长点,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经过 20 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具有了许多 20 年前所不具有的、有利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第一,经济实力、经济基础大大增强了。第二,由于近 20 年大力发展教育,以及经过实践锻炼,高素质的人才多了。第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或说总体目标)已经明确,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可以减少由于目标不明确带来的盲目性,减少寻找目标、摸索前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第四,经过 20 年的探索,逐步积累了一些搞市场经济的经验。许多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法律、法规正在形成和完善。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仍是比较大的。

三、最终能否将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关键在政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今后的 10~20 年间,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难度比较大,但是,潜力也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扬长避短,因势利导,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逐步建立健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法律法规,创造出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好国内储蓄,吸引和利用好更多的国外资金,尊重、保护和使用先进的国内外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努力开拓好国内外市场,特别是国内这一巨大

的市场,积极推进非农产业化的进程和农村城镇化进程,将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樊纲

## 信贷萎缩、发展非国有中小 银行与经济的持续发展

1998 年,在一系列扩张性宏观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将有望实现增长率的回升,GDP 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7.6% 的水平。但是,由于这一结果主要是政府扩大投资的结果,市场上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仍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中国经济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以至在长期内还能否持续增长的问题。

### 1. 信贷萎缩现象

1997 年讨论通货紧缩、经济滑坡的现象与对策,当时我们在国内面临的是两大问题:一方面是 1996 年“软着陆”后宏观经济政策未能及时调整,对投资的控制过紧,导致市场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不良债务比率过高,导致各种金融机构不得不将压缩坏债作为首要目标,从体制上进一步导致“银行惜贷”、通货紧缩。

经过 1998 年的政策调整,以上所说的两大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即宏观政策偏紧的制约可以说已基本消除。但是,第二个问题即由体制原因造成的“信贷萎缩”问题却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在有所加重。

就 1998 年 1~11 月的情况而言,银行贷款余额的增长率为 17%,略高于 1997 年的 16.7%,但仍大大低于 1996 年的 21.2% 和 1995 年的 24.1%。如果扣除 1998 年大量增加的对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贷款,贷款总额的增长率可以说是下降的,也就是说“信贷萎缩”的情况比较上一年又恶化了。这是解释 1998 年非国有中小企业投资几乎没有增长、市场仍不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

需要明确的是,从国内经济来看,1998年经济增长仍不活跃的最主要原因,不是所谓的“消费需求不足”,而是因信贷萎缩而导致的社会(民间)投资需求不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不增加,消费难以增加。增加一些“消费信贷”当然会起一些作用,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何况从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情况看,实际增长率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为此,我们需要着重对信贷萎缩的现象进行一些分析。

## 2. 信贷萎缩的原因

1998年的政策调整,包括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放松。通过两年内6次下调利率和一次性大幅度下调准备金率,以及今年以来采取的鼓励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政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已不再是紧缩性的了。因此,不能说现在存在货币政策意义上的“信贷紧缩”。但问题在于,以下的一系列因素导致整个经济当中仍存在着“信贷萎缩”:

——由于许多国有企业负债累累,坏债比重很高,银行已难以再对其进行贷款,尽管今年中央政府放松了对贷款的管制,但贷款的增加主要是对基础设施项目的长期贷款;

——由于所有制关系的差别,国有银行对私人经济贷款难以增长<sup>①</sup>;

——国家鼓励对中小企业贷款,但国家银行都是大银行,运行成本又较高,难以实现对中小企业的“微观信贷”。利率允许向上浮动一些,当然有利于这类贷款活动的开展,但对信贷的需求本身又会因利率的提高而下降。

——原来一些向非国有企业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由于前些年积累起来的坏帐问题逐步暴露,经营难以为继,国家也开始对它们进行整顿,导致一些金融机构停业,并由此引发许多存款人把大量在这类金融机构中的存款提出来存进国家银行,也导致中小企业所能获得的贷款减少,使过去存在的一些信贷链条中断。

——国家整顿基层小金融机构,如关闭农村合作基金、将信用社并入由政府控制和管理的合作银行等,也使中小企业贷款更加困难,使原有的一些融资渠道不复存在。

总之,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国家银行已不愿对一些国有企业增加贷款,又不能、不愿向非国有企业增加贷款;另一方面,在经济中又缺乏非国有的中小金融机构为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货币当局不断地采取了放松银根的措施,而经济中继续存在着“信贷萎缩”<sup>②</sup>。政府虽然一再强调应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中小企业所获得的贷款并没能有多大的增加,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几乎为零,增长速度也没有恢复。

3. 信贷萎缩的重要体制原因:缺少与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的非国有中小银行业的发展

以上这些情况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对于那些长期高额负债的企业,就是不该通过银行信贷再对其进行“输血”;过去盲目放贷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必须加强风险管理,加大改革力度,该整顿的必须及时整顿。国有企业和银行体系的改革必须加紧进行,不能因一时增长的需要,又开始盲目扩大信贷,使坏帐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但是,以上这些情况也的确暴露出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极为重要的体制问题:除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需要改革,金融市场,包括各种债券、票据市场有待发展之外,我国的金融体制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少一个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非国有银行体系。

我国20年来改革与发展的一个主要成就,就是发展起了一个生机勃勃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它目前已在工业增加值中占到70%以上,提供着95%以上的新增就业,支撑着80%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多年来,我们却一直没能发展起,或者说没有允许发展起一个与非国有产业部门相适应的非国有金融部门;没有发展起一批与非国有中小企业业务需要相适应的非国有中小银行。过去出现了一些萌芽状态的东西,但都被压抑住了,或是关掉(如民间金融、农村合作基金),或是并入“规模较大”、由政府控制的体系中去(如一些城市或农村信用社被并入合作银行),失去了原有的特点和优势(效率较高,较灵活,可以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

这样做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金融资源的配置继续被大大扭曲。只生产 30% 产值的国有企业占用 70% 以上的信贷,而生产 70% 以上产值的非国有企业贷款一直极为困难。

第二,国有企业由于效率低下,必然是借了就坏、坏了再借,自己坏债累累,最终也拖垮了银行,搞坏了整个信用关系(“赖债文化”),最终也导致了信贷萎缩。

第三,当国有企业与国家银行之间发生信贷萎缩并且导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由于不存在一批为非国有部门服务的非国有银行,非国有经济也就难以再进一步起到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反,非国有企业由于没有银行的支持,只好“率先”停业、破产、倒闭(国有企业还是难以这样做)。

在对待非国有银行发展的问题上,我们历来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这里不能一一进行分析。但总的说来,这些年我们一直采取了一种不是在严加监管、不断完善对其管理的条件下鼓励其发展的政策,而是基本上采取了抑制其发展、看到一些问题就把它关掉的政策,以确保国家银行对银行业的控制,结果金融秩序不但一直没能根本好转,反而不是金融混乱、乱集乱贷,就是信贷紧缩、通货紧缩。

#### 4. 积极发展非国有中小银行<sup>③</sup>

限制非国有银行发展有很多“理由”,其中一个很“硬”的理由是:这些金融机构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这里首先要问一下:什么是“正常的金融秩序”。在金融领域内,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秩序是“借帐还钱”。正是在这一点上,民营金融机构恐怕是最遵守“正常秩序”的:很难想象一个民营银行会把钱无休止地不断借给一家亏损严重、屡借而不还的企业。而正是在这一基本点上,我们的国有银行难道不是最不遵守“正常秩序”的吗?问题在于,我们要维护的是哪一种秩序?要不要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新秩序?

发展非国有银行,并不是要放弃政府和国有中央银行对金融秩序的管理,相反,它有利于加强这种管理并使之更加有效。事实上,中央银行很

难对各种国有商业银行实行有效的管理,其原因就在于中央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各级地方政府一样,都是国有的,谁对谁都难动“真格的”,具体问题上总会有一万条理由可以相互“通融”,而代表国家的中央银行对民营的金融机构进行管理,相对来说会是较容易、更有效的,双方的利益划得清,中央银行货币调控措施也会更具权威性。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中央银行管理非国有的商业银行,政府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秩序的基础上,为什么我们总认为允许非国有银行发展就会天下大乱?

在非国有银行的发展初期,由于新旧体制交替,难免会发生一些混乱,需要通过完善法规、加强管理,才能使新体制、新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但若不令非国有银行发展,新的秩序就永远建立不起来,政府也不可能在实践中逐步学会管理非国有银行,我们就永远会有“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我国的非国有生产企业在开始发展的时候,也是毛病很多,导致很多人指责它们破坏了“经济的正常秩序”,而到头来恰恰是这些企业在打破旧的传统计划体制与秩序,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加速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和积极的作用。我们中国的这一特有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与汲取。

事实上,在现实中已经存在着对非国有银行的强大需求,当前若再不发展非国有银行,不仅不利于改革的深化,而且会因资源配置无效率而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中国的生产要素配置,目前仍在向效益逐步下降、对国民收入贡献的比重正在下降的国有经济部门倾斜,而不是在向效益较高、对国民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大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倾斜。而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有的国家银行体制本身不适应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的新的经济结构,在于非国有经济本身还缺乏与自身相适应、为自身服务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基础。

面对庞大的国有银行体制,任何时候谈论发展非国有中小银行都似乎是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但是,任何东西都是从弱小发展而来。我们的非国有经济,20 年前刚开始发展时,谁能想

到今天它成了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用动态的眼光看问题,任何时候开始发展非国有银行都不算晚。

注释

①应该认识到的是,国有银行难以给私人企业贷款,往往是由于很具体的原因。比如,如果一笔给私人企业的贷款出了问题,有关负责人倒不一定被认为是犯了“政治错误”,而是可能被认为收了对方的贿赂,因此使得在实践中人们更怕承担风险。

②我们可以将政府实行货币紧缩政策造成的信贷活动不活跃的情况称为“信贷紧缩”(credit tightening)。而将由信贷双方本身“惜贷”或“惜借”造成的信贷活动不活跃情况,称为“信贷萎缩”(credit crunch or credit contraction),加以区别。

③以下的这段文字,是笔者5年前写的,已被报刊杂志多次引用,但现在看来仍可以用,故照搬至此。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严瑞珍

## 农业的持续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要保持中国经济过去20年来持续高速增长的趋势,除国际经济条件外,农业的持续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可以说农业的持续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由于:

第一,农业是生产人类最必需的生存品的生产部门,农业以外其他任何生产部门以及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等部门的发展规模及速度都是由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来决定的。只有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很高,具有足够提供人们最必需的生存品之后尚有剩余的资源及潜力,才能用于其他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剩余越大,国民经济其他各个部门发展的规模及速度也越大、越快。换言之,要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就首先要保持农业的持续发展。有的同志不承认这个原理适用于现代社会,因为农业在现代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只占百分之几,微不足道。其实这是不对的,现代社会的任何国家一旦经济衰退,不能保证国民的最基本食品及其他农产品的需求,其他各个产业部门的资源就会首先转向农业,优先保证农业的需要,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

这是基础作用的最集中体现。

第二,我国农村人口尚占80%,农村是个巨大的市场。假使农业不能保持高速发展,农民收入不能快速提高,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整个国民经济保持了一定时期的高速发展,最后也会因为农村市场萎靡不振,商品找不到市场而走向低迷。可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首先就要保持占人口80%的农村市场的需求,保证农业的高速发展和不断增长的农民购买力。

第三,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是东部平原及城市的生态屏障,维护着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荣和人们的安居乐业。假使农业发展速度不能与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相适应,在人口的压力下,过去已经发生过的毁林开荒、围湖围海造田、滥垦草原等等就会重演,水土严重流失、旱涝灾害频仍发生、江湖水库淤塞、风沙进逼等等就会严重威胁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去年东北及长江流域的严重水灾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了。要进行生态建设,除了大江大湖的治理需要国家投资外,要大范围控制水土、流沙、污染,还得依靠广大农民的造林、种草、水利建设和小流域治理,而所有这些,没有农业经济的相应发展和持续进步,都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我国农业面临持续发展的许多制约因素,大致谈来有以下三个方面:(1)人多地少,经营规模十分细小,户均不过六七亩地,注定了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和农产品成本高昂。拿粮食来说,即便我国农业劳动力价格十分低廉,但价格仍然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国际农产品价格,竞争能力低下。(2)农业结构和工业一样面临大规模的升级换代。在当前农产品结构中低值农产品占的比例过大,粮食在整个农业播种面积中占了74%。粮食是一种占地多、使用劳动力少的生产部门,在地少人多的我国应该说是一种劣势农业生产部门。但粮食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又必须实现基本的自给,这是一个矛盾,是靠牺牲发展速度来维系的。(3)农业的现代化水平仍然十分低下,不论就农业的装备水平、专业化、社会化、一体化、农艺技术、劳动生产率及商品率等各个方面来说,大体上都还

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低下与规模狭小、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有关,因而积累不起足够用于农业现代化所必需的资金,从而也就阻滞了农业的持续高速发展。

经济十多年的酝酿,农民终于找到了一条农业持续高速发展的道路,这就是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农业产业化是把农业从传统的生产部门改造成为现代产业的过程,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有以下三个方面:

——农业的专业化。就是把农户传统经营转变到专业化生产的轨道上来,这意味着农户除从事粮食生产之外,还从事专业化的集约化水平高的蔬菜、花卉、畜禽、水产、果林及特产农产品的生产。在开始时,这些非粮食的新产业还只是作为农户的副业进行生产的,由于这些新产业收入高、市场前景好,逐渐从副业转为主业,出现了专事新产业的专业农户。在专业农户效应带动下,成长起专业村、专业区。

——农业的社会化。专业化和社会化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农户只要走上专业化生产,就必须依赖于市场、依赖于社会化服务。不能不依靠社会来为他们提供专用生产资料、技术、销售产品等等的服务。这样,专业农户就不再是一个一个孤立于社会之外的单个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个体,而是整个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社会化服务的对象不只是单个的农户,而是面向农户群体的,所以能够实行规模经营,降低了服务成本,迅速成为农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经济成分。

——农业的一体化。社会化的深入发展会逐步推出集技术服务、生产资料供应、产品销售、加工、储藏于一体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即所谓集产供销、农工贸于一体的龙头企业,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的高速发展。

农业现代化无非是指把农业用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的产品装备起来,实行集约化的、社会分工的、规模化经营的农业,具有很高的商品率、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农业。现在,这样的农业在我国通过产业化这个生产力组合方式,正逐步成为现实。

有的同志担心农业产业化,特别是非粮食新

产业的快速发展会削弱粮食生产。其实,这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这些非粮食新产业一般占用耕地并不多,大都利用庭园发展起来的,即使是用耕地,由于实施集约化经营和设施农业,占地不多。

其次,粮食生产的潜力很大,但农民在单一从事粮食生产时收益低,缺乏投资能力,潜力难以开发;现在可以利用非粮食新产业的高收入来增加投入,提高粮食生产的复种指数、低产改高产田、引进新技术等等,把潜力开发出来。最后,随着农业产业化深入开展,一部分专业农户就会逐步对所从事的作为副业经营的粮食生产失去兴趣,而要求把粮田转移给他人经营,粮田向种田能手集中,实行规模经营就有了可能。80年代曾经有过把土地集中在种田能手手中,实现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设想。但是当时由于没有农户愿意把土地转移出去而未能实现,农业产业化就为这个设想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条件。种粮食大户出现的本身也是专业化的一种深入发展,他们可以藉扩大规模,实现机械化生产,引进现代生物技术,实行类似于家庭农场的经营,这对粮食生产本身也是一种推进。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了,凡是产业化开展得好的地区,多种产业全面涌现,但粮食生产不但没有受损,反而单产及总产都有了明显提高。可见,抓粮食生产也不只有就粮食抓粮食一种途径,通过发展非粮新产业并利用这些新产业的高收入来推动粮食生产也是另一种途径。

农业产业化还为粮食的加工及精加工,并把粮食加工的增值部分留给农民创造了条件。把小麦加工成面粉,价值增加 1.2 倍,加工成挂面增值 2.4 倍,制成方便面增值 4.8 倍,加工成锅巴增值 5.2 倍,加工成饼干增值 5.9 倍等等,加工链越长,增值量越大,农民越有可能把加工增值部分留在自己手中。这样,即使种粮大户也能致富。

概括起来,利用农业产业化,对外利用我国农业劳动力充裕、价格较低的优势,向外推出具有高集约度、高科技的农产品;对内提高农民的收入,大力开辟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只要把工作做好,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仍是可能的。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小鲁

## 农村工业化速度趋缓 经济增长将受影响

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20年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农业部分除外)从1978年的0.22亿增加到了1.27亿(1997年数,旧统计口径),占1997年全部农村劳动力的28%。根据估算,乡镇工业企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在40%以上,超过了国有工业的总产值,而且成为非国有工业部门的主力军。在这20年间,乡镇企业的年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高于20%。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资料计算,乡镇企业对GDP的贡献几乎是从无到有,由1978年的4%迅速上升到1995年的31%左右,它在此期间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占到了GDP增长率的1/3,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火车头。

经济改革时期同经济改革以前相比,我国的GDP年增长率由1952~1978年间的平均6.1%上升到1978~1997年间的9.8%,增长速度提高了37%。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是改革期间导致经济增长率加速的最主要因素。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政策和制度变革的结果。自经济改革以来,原来施加于农村经济部门的种种对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配置的限制逐渐地被放松或者取消,从而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20年间,大约1亿农业劳动力进入了乡镇企业,使该部门的就业人数超过了国有经济部门。与劳动力的转移相适应,城乡居民储蓄资金、以及技术和人力资本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乡镇企业。这种生产要素的大规模转移,导致了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

资源配置的优化是提高生产率的源泉。根据计算,在1980~1992年期间,由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配置以及与之相应的资本转移,

对经济增长作出了15%的净贡献,使得该时期我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净加速约1.5个百分点,从8.2%提高到9.7%。这是制度变革引起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结果。当然,制度变革也通过其他途径推动生产率的增长。例如,市场竞争的引入会推动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并加速技术进步的步伐。但就过去20年的情况看,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更为突出。

制度变革对于经济增长的加速效应是明显的,但随着制度改革进行,这部分能量会逐步释放出来,它对增长率的加速作用也将逐渐减弱。而在制度改革完成以后,它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逐渐趋于消失。经济将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相对较低的稳定增长阶段。

制度变革所导致的农村工业化是否还能使未来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高速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1. 是否依然存在阻碍农村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制度障碍? 2. 是否还有大量生产要素未得到合理配置?

关于前一个问题,就总体而言,大量直接影响劳动力和资本在农村各部门之间流动的制度和政策限制已经取消。虽然局部地区仍然存在一些限制因素,但总体来看这方面增长潜力已经不很大。

关于后一个问题,可以说在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工业化的程度总的来说已经比较高,其中有些较先进的地方,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经非农产业化,因此在这些地方劳动力优化配置的潜力已经不太大。但在中、西部地区仍然较低。还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中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乡镇企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率在这三个地区差别仍然非常悬殊。西部地区在1994年的农村工业化程度,如果以劳动力的吸收率来衡量,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1/3强,还未达到后者1980年的水平。

显然,如果在今后10~20年中,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非农产业化能够以东部地区在过去20年间的速度发展,还是可以对经济增长作出相当的贡献。尽管由于经济基数增大,它对增长率的相对贡献不会有过去那样大。不过从近几年的趋势看,这种“相当的贡献”可能性也不大。在1980~

1992 年间, 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的年增长率为 11.1%, 而在 1992~1997 年间降低到 4.2%。其中东部地区只有 3%, 中、西部虽然稍高, 也只有 5.8% 和 4.3%。而另一方面,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特别是流入东部城市)的数量倒是增长迅速。

这种农村非农产业增长速度减缓的趋势, 看来主要是由如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一, 近几年市场需求疲软, 缩小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其二, 1993、1994、1995 年国家连续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工农业产品的比价, 使农业变得多少有利可图, 从而延缓了非农化的过程。其三, 在东部地区, 制度变革的效应已经大部分释放出来, 而中、西部地区则面临其他方面的资源约束, 使制度变革没有对经济增长带来像东部那样大的贡献。同前两个原因相比, 这最后一方面的原因显得更为突出。

所谓其他资源约束, 主要是指人力资本、技术、基础设施、金融服务以及市场集约度方面的约束。以下逐一进行分析。

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在人力资本和技术供给方面的资源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 东部地区明显占优势。以科研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而言, 东部地区高于中部 1 倍以上, 高于西部 35%。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学龄以上人口的比重, 东部为 49%, 西部仅为 37%。在许多情况下, 人力资本和技术是不能用劳动力和资本来替代的。中、西部地区的许多实例说明, 即使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资金, 由于技术和管理人员的缺乏, 乡镇企业还是难以发展。事实上人力资本还不仅限于科研人员数量和劳动者的教育程度。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 特别在其初创时期, 曾大量从当地国有轻纺企业吸收有经验的退休工人和技术人员。这方面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是中、西部地区所缺乏的。此外, 东部地区历史上的商业传统和商业活动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渗透, 也是使东部乡镇企业管理精英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方面的约束, 西部同东部地区相比在铁路、公路、内河和海上运输等方

面的条件都处于显著不利地位。如果考虑到其土地面积的辽阔, 这方面的差距更大。中部虽然在铁路里程方面超过东部, 公路里程大体相当, 但在海上运输和内河航运方面却远不如东部有利。

关于金融服务, 东部地区得利于其早期的乡办、村办企业模式, 在获得农行和信用社贷款方面先走了一步。中、西部地区许多地方受到基层组织管理水平的制约, 乡、村企业模式未能发展起来, 而私人、个体企业由于规模小、风险大、缺乏担保, 在获得金融信贷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这方面情况的改善将有待于农村中小金融服务机构的发展, 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最后, 关于市场集约度, 主要体现在城市化水平方面。农村企业临近城市就等于临近广阔的市场, 同时也更有利于获得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供应。目前全国 1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 东部也多于中部和西部。

由于上述这些制约因素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改变, 这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制约中、西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乡镇企业就业的增长率很可能在相当长时期保持在 4% 或以下的水平。如果加上其他因素的考虑, 例如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市场需求变化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 那么今后若干年内乡镇企业继续维持 20% 以上高增长率的可能性相当小, 很可能维持在 10%~15% 的区间内。这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可能将高达 1.5~2 个百分点。

换言之, 中国经济今后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 否则将不可能维持像前 20 年那样的高增长率。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贺力平

## 市场需求是制约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

众所周知, 需求代表市场交易的一方, 是经济均衡的一面; 同样为人熟知的是, 对任何一个国民



经济而言, 制约长期增长前景的主要因素理所当然地是那些影响潜在供给能力及其增长的因素, 例如劳动者或生产者的工作动力、经营者对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关怀、资源和环境的可再生性等等。因此, 说“市场需求是制约(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看起来要么是在重复经济学常识中的 ABC, 要么是偏离经济分析的主题。

然而, 本文提出这个命题有两个特殊的用意: 首先, 我们希望强调,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将会发生在一个迥然不同于前20年的经济环境中。如果说在前20年(或者说尤其突出的是在较近的几年中), 我们的国民经济处于转轨并可能接近于完成, 在新的经济体制环境中, 市场需求的作用对我国所有经济活动者的意义毫无疑问都将空前地提高。其次, 我们还想表明, 市场需求会由于复杂的原因而出现波动; 社会如果不能有效地对付短期性的需求波动及其对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 那么, 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景也可能受到影响; 而且, 在对待需求波动问题时(亦如对待其他社会问题一样), 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采取决定论的思路, 也许我们应当多一些使用相对论的分析方法。

以下首先概括地说明我们经济体制朝着市场化方向的转变, 接下来简要讨论需求分析的基本思路。

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趋势, 一是伴随着社会资源分配的变化而出现的居民部门的扩大, 进而促使我们的国民经济从“政府需求依赖型经济”转变到“市场需求依赖型经济”; 二是伴随着社会资金来源的变化、资金约束的强化和政府经济活动的重新定位, 我国的生产者越来越多地被迫采用企业化生产方式, 而按照企业化生产方式, 生产和投资两者都必须是市场导向的。

先看第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前的20年中, 我国曾建立起了一个高度计划化和半军事化的经济体系, 在这个经济体系中, 以中央政府及其各个部门为核心的政权机构集中了全国的经济的主要资源, 它们的计划工作——即对各项资源的征收、调集、分配和使用——形成了社会需求的主流; 工厂

活动和基本农业生产活动围绕政府指令性计划(政府需求)而运转; 城乡居民的自主性消费主要限于日用消费品。(城镇居民对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等的需求往往被“公共物品化”了, 即主要通过集体性消费的形式而不是通过个人自主性选择。)不论是在短期中还是从长远看, 那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在损害资源使用效率的前提下调动全国经济资源的能力。

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改变了这种经济格局。国民收入开始向居民部门倾斜。首先, 农村居民从农副产品价格调整中获得了收入增长, 并从将资源转向高价格农产品生产中得到了收入增长。其次, 城市居民的收入也随着工资调整、大量生产性部门向个人经营者开放而得到了快速增长。第三, 随着公司化、证券市场的发展及银行成为经营机构资金的重要提供者, 企业所得中越来越大的部分以红利和利息等形式转向个人投资者或储蓄者。

收入在部门间分布格局的这种变化促使居民部门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高。中国经济中出现了“市场需求依赖型经济”的特征: 居民部门成为社会需求的主流; 在住房和福利等方面的“货币化”改革措施促使居民个人拥有更多的抉择自主权; 居民消费形成最终需求; 企业的生产活动围绕居民需求而运转; 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征集主要依靠税收和债务融资, 而不再是过去那种“先通过官定价格等手段将社会净产值向工业部门集中, 然后通过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上缴形式集中到政府手中”。

第二, 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资源分布的变化, 企业扩张和政府经济行为出现了方向性改变。生产部门的投资在过去主要依赖政府的财政性资金投入, 在改革的过渡时期中主要依赖国有银行机构“半财政性”信贷资金投入, 这两种资金投入方式都未对生产部门的资金回报率提出足够高的要求。现在和未来时期中, 企业化的中国生产部门将越来越多地依赖资本市场取得投资资金; 随着国有银行自身的体制改革和商业化, 国有银行机构也将对企业客户提出越来越高

的资金回报率要求。为了满足资金提供者对资金回报率的要求,作为资金使用者的企业被迫贯彻资金使用效率原则。而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企业只有走上面向市场的道路,积极适应市场,并根据对市场的研究和预测调整自己的投资行为。因此,市场需求、尤其是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影响企业投资的决定性因素。

政府已经放弃了试图建立无所不包的国有经济体系的企图。相应地,政府开始按照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来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即,将政府经济活动主要限制在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上。那些被允许保留下来、在非公共物品领域中继续活动的国有企业,也正在被要求更加重视市场化的经营原则。因此,全面地看,在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将以市场为导向。

在上述经济格局转变中,我们看到,居民部门越来越像是(或者说在越来越大程度上就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提供者或转让者,同时又是社会最终需求的主要决策者;企业部门就是生产要素的独立使用者、组织者或经营者,是社会需求的反映者。这两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循环流。

也许人们会说,由于土地这个基本生产要素在我国仍然属于国有(在农村属于集体所有)、来自土地出租的要素收入因而不进入(或者说大部分不进入)居民部门,这就制约了居民部门的相对增长。应当承认这是一个基本上正确的判断。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在现阶段,由于一系列复杂原因,地租或土地价格似乎并未成为调节社会收入在居民部门和非居民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重要手段,而且,在未来的我国也很难如此。主要理由:首先,在农村地区,只要土地不转为非农用途,“无地租”或低地租大量存在;其次,在城乡土地转让或城市土地使用中,对土地要素的回报大量注入中间或中介环节,即土地的非所有者或非原有者手中,因而也就流进了居民部门;第三,从长远看,不管我们最后将实行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我们都很难指望通过提高土地的原始价格(批租

成本或竞争性售卖价格)来抑制中间部门或居民部门通过土地经营或土地再转让而获得收入增长。在这方面,香港的经验似乎可以说是世界各地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情况。总之,展望未来,居民部门及其需求行为是我国市场前景分析的一个焦点。

那么,需求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吗?对这个问题,经济学的前辈们已经从理论上作出了回答。例如,李嘉图和后来的马克思说,生产所得不一定能均匀地分布于各个要素之间,从而不能在收入与生产(供给)之间划等号;凯恩斯说,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决定了他们只支出他们新增收入的一部分,从而使得需求与收入之间的恒等式可能出现破裂。自1997年9月以来,我国零售物价指数出现负增加迄今已连续近一年半。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近一年来也一直在百分之零点几的水平上滑动。一些国家的研究表明,现行的、以历史价格水平为基数的物价统计方法不可避免地、自动地包含着高估物价走势的因素(偏高估计可多达1个百分点)。据此可以说,既然不到1%的物价指数增加已经可能显示了通货紧缩,低于这个水平的我国物价走势十有八九表明我们目前已陷入了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局面。不管造成目前局面的具体原因是什么,都说明需求已经成为制约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对付目前形势,政府已经采取了积极的宏观措施。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措施将会产生积极效应,成为通货紧缩的对抗性因素。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社会经济是复杂的,如果能让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出足够的积极效应,我们也许还需要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需求行为的相应调整。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就不应再坚守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只要一项宏观措施贯彻下去,其余问题便迎刃而解。我们已经不再能去直接命令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改变他们的需求行为,我们所能做的至多是通过间接途径去影响他们的行为。既然使用间接手段,我们的分析就应当包含相对论思路,即更多地考虑到受影响对象自身的利益需要,以及他们对环境和政策变量反应行为的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 平

## 国家投资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国家投资的扩张与收缩直接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周期的波动,传统体制下国家通过统收统支的高度集权的方式配置资源,国家投资直接决定着经济的波动,被人们称为“计划周期”,当时国家投资表现为财政性拨款给国有企业进行投资(中国当时的财政支出是建设财政,而不是西方的公共财政)。国家直接计划控制经济的方式到1984年后开始发生了变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1984年后,中国开始进行了地方行政性分权的改革,国家统收统支的体系被打破,形成了中央、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分担国家投资的格局,尽管有行政性分权的改革,国有企业一直仍然是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建设投资)投资的主要承担者,国有部门的投资仍是国家进行建设性投资的主体,但经济周期波动的微观基础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传统的计划集权化分配投资的模式转到地方分权化的投资模式,国家投资的每一次扩张,不是由计划者决定,而是由地方政府和具有“软预算”的国企的投资扩张所决定,形成投资的“倒逼机制”。像1988年的经济波动主要由于当时地方政府过度地“重复建设”,导致投资扩张引起价格波动。

中央、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这三个投资主体在市场化改革后,直接从财政进行融资和投资的比重下降。但由于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步伐较慢,中央、地方项目和国有企业投资都来源于国有银行,这就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的“银行融资推进发展”的阶段,这里存在着非常强的“软预算约束”,国家只要一放松控制,各地方政府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重复建设严重,出现资源的瓶颈制约,引发通货膨胀,国家通过收紧信贷,进行项目控制抑制经济过热。从波动的形式看,依然是先固定资产,主要是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先行启

动经济,最后又以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而结束。但由于分权化后,控制手段从传统体制下单纯的计划和财政手段调控转到了银行信贷和计划控制相结合的方式上。到1992年后,市场化改革加速,产品价格已经基本自由化,非国有企业占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国有部门,占到了50%以上,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发展迅速,资本市场发展很快,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行为也越来越接近市场化行为模式,企业对各类价格信号较为敏感,但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依然。1992年经济高速发展,也是由投资引致的,1993年固定资产名义投资高达60%多,国有部门的投资一马当先,引起了非常高的通货膨胀,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提高到了65%以上,银行坏帐激增。国家、国企和国家银行所代表的不负责任(不计效益)的国家投资是这次经济大波动的最主要原因,也留下了很多恶果,如银行坏帐、国企负债过高等。国家于1993年后期开始收紧银根,提高利率(保值利率),降低投资和消费需求,加强银行的监管,积极推进国有银行商业化的改革,从而较好地克服了“软预算”,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国家的宏观管理依然处在转型过程中,间接控制的比重提高了,如利率杠杆、货币供给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靠间接手段启动经济再次受到挑战,国家重新运用财政手段(但这次强调的是非建设性的财政)刺激经济的复苏,投资注入的方向仍是国有部门,1998年9月份,国有部门投资猛增到33.2%,再次拉动了经济的回升,但由于国有部门的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仅仅有30%强,拉动的力度再衰减,所以经济回升速度明显放慢。纵观改革过程,国有部门的产出比重不断下降,从改革初的75%下降到现在的30%强,市场化进展明显(很多学者以此作为市场化指标),但国有投资份额下降却没有这么迅速,至今其投资的比重依然保持在60%以上(1998年估计),而这一投资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扩张和收缩,国家宏观调控离不开它。

尽管中国市场化改革,使微观经济基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经济周期波动具有了商业周期波动的特征,但国有企业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

纯粹的宏观间接控制依然是不能完全奏效的,这是因为国有部门仍然不是价格信号的响应者(price taker),而是能“逼迫”宏观政策制定的部门,世界银行、IMF 和长期关注中国宏观变动的研究者都认为在国有部门没有彻底改革之前,货币政策有效性都是值得怀疑的。

随着国家部门的收缩,国家投资对经济波动的作用在下降,特别是非国有部门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产出比重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投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因为非国有部门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基本是依照市场准则进行的,这也是近年来经济周期波动幅度缩小的原因,也是这次通过国家投资方式启动经济困难的原因。这次启动经济过程中,由于金融服务体系纵向整组,国家投资主要是依赖传统的投资方式,计委定盘分配,带动效果有限。

国家投资主导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供给模式,资源分配非常不利于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的非国有企业。在非国有部门产出已经占到近七成的格局下,它们只能享受到投资中的三成,大量的投资透过国家渠道投入到低效的国有部门。国家投资大量注入到国有部门,尽管强调了投入到基础设施,但这些基础设施的项目并非是纯粹的公共产品,仍是经营性的,这种投资应该仍然视为生产性投资,而这种投资又是以国家投入的方式由国有部门运营,未来效率保证和还贷能力依然

令人堪忧。

并非说国有部门效率一定低,但由于国家投资本身固有的“软预算”的补贴性质导致了国有部门在利用国家投资运营项目时效率无形中就可以低。国家投资的“软预算”扭曲了资本要素的价格,资本密集型的速度在国有部门加快,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急剧下降,这也是城市失业的原因。

中国宏观调控逐步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方式,经济增长能够健康稳步地发展,国家的投资体制必须改革。其改革的方向起码应该有三条:一是建立多元化的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强调非国有银行的发展,并适当放开贷款利率;第二在资本市场上采取更为中立的上市规则,使非国有部门能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支持,加快二板市场或试点性开放场外交易;第三在国债运用方面采取政府招标方式进行投资,改善国家投资的运营效率,再也不能出现财政一出钱,各地方就来抢项目的状况了。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劳动力转移的压力,采用比较优势的战略应该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由于国家投资导致的要素扭曲,资本过密化倾向加强,这是不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一个重要点就是要调整要素价格,加快自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责任编辑:尚增健)

纯粹的宏观间接控制依然是不能完全奏效的,这是因为国有部门仍然不是价格信号的响应者(price taker),而是能“逼迫”宏观政策制定的部门,世界银行、IMF 和长期关注中国宏观变动的研究者都认为在国有部门没有彻底改革之前,货币政策有效性都是值得怀疑的。

随着国家部门的收缩,国家投资对经济波动的作用在下降,特别是非国有部门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产出比重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投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因为非国有部门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基本是依照市场准则进行的,这也是近年来经济周期波动幅度缩小的原因,也是这次通过国家投资方式启动经济困难的原因。这次启动经济过程中,由于金融服务体系纵向整组,国家投资主要是依赖传统的投资方式,计委定盘分配,带动效果有限。

国家投资主导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供给模式,资源分配非常不利于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的非国有企业。在非国有部门产出已经占到近七成的格局下,它们只能享受到投资中的三成,大量的投资透过国家渠道投入到低效的国有部门。国家投资大量注入到国有部门,尽管强调了投入到基础设施,但这些基础设施的项目并非是纯粹的公共产品,仍是经营性的,这种投资应该仍然视为生产性投资,而这种投资又是以国家投入的方式由国有部门运营,未来效率保证和还贷能力依然

令人堪忧。

并非说国有部门效率一定低,但由于国家投资本身固有的“软预算”的补贴性质导致了国有部门在利用国家投资运营项目时效率无形中就可以低。国家投资的“软预算”扭曲了资本要素的价格,资本密集型的速度在国有部门加快,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急剧下降,这也是城市失业的原因。

中国宏观调控逐步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方式,经济增长能够健康稳步地发展,国家的投资体制必须改革。其改革的方向起码应该有三条:一是建立多元化的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强调非国有银行的发展,并适当放开贷款利率;第二在资本市场上采取更为中立的上市规则,使非国有部门能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支持,加快二板市场或试点性开放场外交易;第三在国债运用方面采取政府招标方式进行投资,改善国家投资的运营效率,再也不能出现财政一出钱,各地方就来抢项目的状况了。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劳动力转移的压力,采用比较优势的战略应该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由于国家投资导致的要素扭曲,资本过密化倾向加强,这是不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一个重要点就是要调整要素价格,加快自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责任编辑:尚增健)